

革命伉俪：一文一武共硝烟

(上接 A03 版)

我本来还没打算结婚的，可一听张生荣这么优秀，我当家的嫂子也对他很是满意。经过他们里里外外做工作，我认真考虑之后，最终同意了。

在杨成武的爱人赵志珍的张罗下，部队为我们特批了6角钱，这相当于张生荣一个月的军饷。张罗几桌饭菜请大家吃了一顿，这就表示我们正式结婚了。

之后的十几年里，我先后孕育了十来个小生命。可惜的是，因为条件恶劣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活下来。从解放战争起，我一路跟随他，先后在察哈尔军区、四野补训师、湖南军区等地工作……

就这样，原本只在一块儿吃三天饭，结果却在了一口锅里吃了69年。

戏，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演过了，快板倒是还能来一段：“太行山高又高，十万大军在山腰，神出鬼没战术好，我们的大军在山腰！”

人物档案



张生荣

性别：男
出生年月：1919年7月
抗战经历：1937年9月，红115师独立团司令部司号员；1939年9月，晋察冀一分区司号连长；1941年8月，晋察冀司令部司号长；1942年6月，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学员；1943年3月，晋察冀一分区20团3连1排副排长；1944年2月至1945年8月，延安学习。

为大渡河勇士吹响冲锋号

作为一名司号员，号角是张生荣的武器。司号员是中国人民军队曾经独有的一个兵种，其主要职责是吹军号。“司号员鼓鼓嘴，千军万马跑断腿”，这句当年流传在军营中的顺口溜，形象地说明了司号兵的重要地位。

我父亲1927年参加了地下党，是村苏维埃主席。当时村里成立了赤卫队、少先队和儿童团，我9岁就参加了儿童团，当过班长和排长，背上自己做的小木枪，在村子周围的路口站岗放哨、查路条。12岁，我报名参军，母亲心疼我年幼体弱不同意，等到我第三次报名时，她才哭着答应了。1931年10月，我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央红军（后改称“红一方面军”），在独立第3师8团当团长的勤务兵。

1934年8月的一天，首长跟我们说，部队要出发，要打到白区去。我们当时并不知道，长征在此时便已开始了。那一年我15岁，已经是一名司号员了。

在战斗中，司号员是指指挥官的左右手。所有号令加起来有上百种，不同部队的号令都有它独特的密码。通常，“嘀嗒嗒嘀嗒—嘀嗒嗒嘀嗒”，这是冲锋号；“嗒哩嗒嗒嗒嗒哩—嗒哩嗒嗒嗒嗒”，这是前进号；还有起床号、休息号、吃饭号、疏散号、紧急集合号……

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，就是我们吹响的冲锋号。

1935年5月，蒋介石欲凭借大渡河天险，歼灭红军于大渡河南岸，红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北岸渡口。5月25日，占领了安顺场的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，组织18名勇士强渡大渡河。

那河水好急，对岸又有敌

人碉堡封锁渡口，当时我们只找到了一艘小船，勇士们得分两批过河。在我们吹响冲锋号的一刹那，岸上轻、重武器同时开火，以作掩护。政委肖华就站在南岸河边，领着我们吹冲锋号。在嘹亮的军号声中，勇士们迎着川军的枪弹炮火，冒死向北岸突击，最后强渡成功。

平型关阻击，军号用处大

1937年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。同年8月，张生荣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，他担任独立团团部司号长。开国上将杨成武时任独立团团团长。

在平型关战役中，一一五师独立团阻击了敌人援军三天三夜，歼敌300余人，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日军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1937年7月，我们从陕西的遵宁县出发，东渡黄河，乘火车北上奔赴抗日前线。到达太原郊区车站时，成群结队的工人、学生见到我们，边高呼着“打鬼子的队伍来了”，边用箩筐挑来花生、红枣、煮熟的鸡蛋，一个劲儿地往车厢里倒，战士们接不过来，车厢过道里到处都是他们扔进来的礼物。火车开动时，团长杨成武命令我吹响前进号，战士们唱起前进歌曲，奔赴前线。

1937年9月23日清晨，杨成武率领我们分三路，向腰站急行军。我们到达时，日军已先占领了山上马鞍形的隘口驿马岭。杨成武果断下令突袭，战士们猛打猛冲，一下将敌人击溃，击毙敌人几十名、战马数匹，还缴获了一面日本国旗。

下午4时，敌军增援部队前来，敌我双方对峙在白羊壁、安京一线上。经侦查得知，敌人有一个中队的兵力，杨成武团长先是派一个营去阻击，与敌交火后才知道，敌人一个中队比八路军一个团的兵力还要多。杨

成武团长等领导研究后，命令我吹起冲锋号。我鼓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在枪林弹雨中，把冲锋旋律吹了无数遍。指战员们在号声的鼓舞下，战斗气势高涨。各连队的司号员听到我的号音后，也一齐吹响了冲锋号。随即其他两个营也跟着冲了上来。振聋发聩的冲锋号声把敌人搞得云里雾里，以为我们是大部队，相峙之下，根本不能前进半步。

次日，我团趁着晨雾，又在冯家沟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，拖住了一支想向平型关增援的日军运输部队。当平型关大捷战报传来后，我团的阻击任务完成了，准备按上级命令撤出战斗。在撤退之前，杨成武团长指示我们，继续向山上的敌人发起佯攻，蒙蔽敌人，命令我再次吹响冲锋号。敌人听到号音，机关枪、迫击炮一齐向我们打来。在十几分钟冲锋号声的掩护下，我们的部队都已撤出了战斗，敌人的炮火还在那里响个不停，完完全全是放空炮。

为白求恩葬礼吹奏哀乐

1939年9月，张生荣来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，担任司令部司号长兼司号连长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把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当作己任的白求恩大夫。

1938年底，白求恩大夫来到晋察冀一分区，帮助部队提高医疗水平。

我记得，在司令部为他准备的欢迎会上，他首先装老人，衰弱得腰都直不起来，随即又把背挺直了，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：“我才四十几岁，是个正当年的外国人。”他的乐观与幽默逗乐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在晋察冀地区，白求恩大夫工作了两年。他的医疗技术高超，战士们都说，有了白求恩大夫，打鬼子负了伤也不怕。

可惜的是，1939年11月12日，白求恩大夫在医治伤员时因

手术感染败血症，在河北唐县去世。这时，日军因在黄土岭惨败，更加疯狂地对边区进行扫荡。尽管这样，聂荣臻司令员仍决定为白求恩大夫举行殓殓典礼。

17日，上级命令我带着一分区司令部司号连的全体司号员参加葬礼。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吹响号角，此时的号角不再嘹亮高亢，只表达了无限的哀思。

宁可不当官，也要痛痛快快杀鬼子

为了给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培训军政干部，1938年12月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决定，抗日军政大学组建第二分校。此后的4年多里，这里先后培养出了武工队长、游击队长、县大队长和八路军师团一级的干部共2万多人。张生荣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42年6月，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司号长，我被派往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习了一年的军事。次年4月，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去晋察冀一分区政治部任指导员，与我谈话时，我表示，我想上战场去打仗、杀鬼子。

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，要打仗就只能被安排当副排长。但我想得开，副排长就副排长，我不图官，不图名，当了那么多年号兵，还是想跟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。于是，我成了晋察冀一分区20团3连1排的副排长。

“他这辈子做了不少的傻事，不当指导员去当副排长，后来又放着警备股长不当，去当通讯副股长，等到解放后他任浏阳兵役局长时，还只是个团级，比起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红军，落后了一截。”老伴赵贺勋虽然说着老头子傻，但张生荣一生获战功无数，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……也许在她眼中，“傻”丈夫自是真英雄。

(张生荣言谈，部分摘自其回忆录)

记者手记

英雄老矣，美人迟暮。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一度让我以为采访无法再进行下去。96岁的张生荣听力已经很差，你在他耳边大声提问，他依然表情茫然；赵贺勋眼睛不好，半米开外，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。

但请允许我用“神奇”二字来形容此后的发现——张生荣老人虽然耳聋，但视力极好，A4纸上的5号字，他竟字字可辨，用文字提问，他便能领会，还将资料中有关妻子的内容念给她听；赵贺勋眼神不好，但听力极为聪敏，老伴儿听不清的问题，她可以字字句句清楚地代他回答……

突然被这幕场景感动，它将我从血肉模糊、硝烟四起的残酷战争中剥离。正如当年她军歌嘹亮、他号角铿锵，硬朗的风骨、红色的情怀背后，英雄长出了血肉，铁血也充满柔情——而如今这样的生活，也许正是当年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们的初衷和归宿。

(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)